

← (上接12版)

想要姻缘,等诸自检以下,不犯着去说他。(随波、珠儿译《巴黎女子》,《小说月报》,1914年第7期第1、6页)

目前,并没有发现在国内刊物上《项链》的最早汉文直译本,最早的汉文直译本可能是1920年发表在留日学生创办的刊物《学艺》第6期上的崔雁冰译的《项圈》。其“译者识”写道:“莫泊三系法国自然派文学的巨子,与俄国契诃夫同称现代短篇小说作者的名手。他一生著作绝富,短篇小说介绍到中国来的已竟很多,长篇则仅有王崇植君译的‘人生’。”之所以要选择这篇,可能是虽然莫泊桑的许多短篇小说已译成中文,但这一篇有必要译出,但均是意译,所以有必要重新进行直译,如开头便是:“伊是娇艳动人女儿中的一个,时运不齐,生长在书记的家庭里。伊没有钱,没有希望,也没有法儿使有钱的人及有声望的人认识伊,晓得伊,恋爱伊,并同伊结婚;伊只好嫁给一个公共教育部里的小书记。”[崔雁冰译《项圈》,《学艺》(日本),1920年第6期第1页]

不过,根据1922年吴弱思在《最小》报上发表的《两篇项圈》来看,当时国内仍有其他译本,严格地说仍属于改作,如张枕绿改作的《项圈》,吴弱思写道:“法国毛柏桑作的一篇《项圈》,内容略述一个爱慕虚荣的少妇……此篇已经译成数十国的文字,传颂全球,便在我国也有许多人把他译过了。近见《快活》杂志三十五期中也载着张枕绿作的一篇《项圈》。题下注着‘读了毛柏桑的项圈改作’一行小字”。接着他批评改作是“窃取外国小说的资料,改头换面而成篇”。(吴弱思《两篇项圈》,《最小》报,1922年第12期第2、3页。1921年,李璜在1921年第三卷第6期《少年中国》发表的《评莫泊桑的小说》中说:“年来国内翻译莫泊桑的短篇小说很不少。现在并且渐渐有人翻译他的长篇。可见国人爱读莫泊桑小说,这或者是因为莫泊桑的才调特别适合我们的口味。”李璜评介的是李劫人翻译的《人心》,即《一生》。另外《少年中国》1922年第11期刊登了陈生翻译的《我的叔叔虚乐》,即《我的叔叔于勒》。这本杂志还刊登过大量涉及法国思想、文化、文学方面的文章或译作,这大概是因为少年中国学会的成员余家菊等人在法国留学过或考察过而认为中国应效仿法国,或是倾慕巴黎公社革命。)这篇改作写女主人公向自己已出嫁的姐姐借首饰,结



《苦闷的象征》书影,厨川白村著、鲁迅译。在这本书中,厨川白村称《项链》是莫泊桑所著短篇小说中有了“定评”的“杰作”,并专门对《项链》的艺术成就进行了分析。鲁迅翻译此书时邀请自己的学生常惠根据法文翻译了《项链》并附在汉译本之末,正是鲁迅的译介和常惠的译作使得《项链》被视为“名篇”。

“杰作”。厨川白村在书中介绍完“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之后,专门对《项链》的艺术成就进行了分析,他说:

这项链的故事,摩泊桑是从别人听来,或由想像造出,或采了直接经验,这些都且作为第二的问题;这作家的给与这描写以可惊的现实性,巧妙地将读者引进幻觉的境地,暗示出那刹那生命现象之“真”的这伎俩,这先使我们敬服。将人生的极冷嘲底(ironical)的悲剧底的状态,毫不堕入概念底哲理,暗示我们,使我们直感底地,正是地,活现地受纳进去,和生命现象之“真”相触……摩泊桑倘若在最先,就想将那可以称为“人生的冷嘲(irony)”这一个抽象底概念,意识地表现出来,于是写了这《项链》,则以艺术品而论,这便简单得多,而且堕入低级的讽喻(allegory)式一类里,更不能显出那么强有力的实现性、实感味来,因此在作为“生命的表现”这一点上,一定是失败的了。怕未必能够使那可怜的官吏的(增加)夫妇两个,活现地,各式各样地在我们的眼前活跃了罢。正因为摩泊桑无意识心理中的苦闷,梦似的受了象征化,这一篇《项链》才能成为出色的活的艺术品,而将生命的震动,传到读者的心中,并且引诱读者,使他也做一样的悲痛之梦。(厨川白村著、鲁迅译《苦闷的象征》,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第62—63页)

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说主要受弗洛伊德的创作无意识理论的影响。该理论认为,作家之所以创作就是因为内心积聚了某种人生的苦闷,而创作只不过是作家所做的白日梦而已。正因为创作是无意识的心理体现而不是有意识的概念图解,所以作品所写的是最真实的,也是最能打动人的。上述对《项链》的分析就是如此。关于《项链》的思想内容并不是其分析重点,不过在分析其艺术手法时也涉及了一点,如认为这是一个悲剧,可怜官吏夫妇堕入了刹那的

人生幻像,作者写作就是讽刺这对夫妇把虚幻当成真实,希望读者能从这场“悲伤的梦”中感受到生命的“真”相等。不过,到底是什么“真”相,厨川白村也没说明。

可能是因为厨川白村对《项链》情节的概括过于简略,为了让读者能结合原文理解厨川白村的分析,鲁迅还邀请自己的学生常惠根据法文翻译了《项链》并附在汉译《苦闷的象征》之末。汉译《苦闷的象征》可能是对《项链》最早的汉文评介,常惠的译本是国内发表的《项链》较早的汉译本。

《苦闷的象征》出版的当年(1924),鲁迅在女师大上课讲短篇小说时就高度评价过莫泊桑和《项链》。他说:“世界有两大短篇小说家,一个是法国的莫泊桑,一个是俄国的契诃夫。”他认为,契诃夫作品的思想内容要超过莫泊桑,因为他写的每篇小说都含深刻的哲理而发人深思,不过,“若从艺术方法上来看,那么,契诃夫就比不上莫泊桑了。他的作品,无论从形式、结构以及表现手法来看,都达到了短篇小说所要具备的高度”。可见,在鲁迅看来,莫泊桑的小说之所以受欢迎主要是因为其艺术成就。听课的学生立即向鲁迅发难:

周先生,您说莫泊桑的作品,思想内容比不上契诃夫,我看你翻译的《苦闷的象征》,作者厨川白村,对于莫泊桑的《项链》还是大为激赏的吗?这又怎样解释呢?

其实,我们在前文分析过,厨川白村赞赏的是《项链》的艺术手法高超,鲁迅对莫泊桑的评价自然也受其影响。这位学生可能并没有细看厨川白村对《项链》的分析,而认为厨川白村赞赏《项链》主要是因为其思想内容深刻。面对学生的诘难,鲁迅迅速以厨川白村的论述中的思想内容来辩解:

我刚才说从思想内容看,契诃夫的作品要比莫泊桑强,这是笼统地比较着说的。莫泊桑在近代文学史上,也不失为大家之一,他的许多作品中,自亦不乏其味深长的杰作,《项链》即是其中之一。厨川氏的赞赏《项链》,是说它将刹那间的幻觉,当作生命现象之真,以致堕入悲剧的境地,影响一生的命运,这富有哲理性的暗示,使读者读后如梦方醒,遂使终于成为不朽的名篇。(孙席珍《鲁迅先生怎样教导我们的》,《鲁迅诞辰百年纪念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96—97页)

其实,鲁迅所采取的只是一种辩解策略而已,因为如果

《项链》以思想内容见长,只要读一下作者对其情节的概括和对其思想内容的分析就足够了,就不必让常惠翻译全文附录于《苦闷的象征》之末了,而要真正理解厨川白村对作品艺术成就的分析,就必须阅读原作,所以让常惠翻译全文作为附录。常惠曾回忆过当年鲁迅告诉他准备翻译《苦闷的象征》的经过。他告诉鲁迅《苦闷的象征》已有丰子恺的译文在报上连载,鲁迅听后要他找来一读,读后,鲁迅告诉常惠自己决定开始翻译,并让他帮助:

先生又跟我说:“书里提到法国作家莫泊桑的一篇《项链》,你能给我找一找译本吗?”我答应了,结果译本没有找到。我对先生说:“译本找不到,我给先生翻译吧。”我就把这篇小说从法文给译成中文。同时《苦闷的象征》中还引用了法国作家波特来尔和比利时作家望莱培格的两首法文诗,我也给先生译了出来。《项链》作为《苦闷的象征》的附录,印在后面。(常惠《回忆鲁迅先生》,《鲁迅诞辰百年纪念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23页)

《苦闷的象征》中提到过多篇艺术作品,而鲁迅首先想到的是让常惠替他找《项链》的中译本;后来,常惠翻译了书中所引用的几篇作品,但他仅选用了《项链》以作附录。可见,在鲁迅看来,《项链》是书中所提到的艺术成就高超的作品中的典型。

因为鲁迅在课堂上称其为不朽的名篇,而且作了这种解读,那么这些听课的师大学生,毕业后到中小学任教时,必然会提及《项链》,而且可能会对其作出鲁迅式的解读。

也正是鲁迅的译介和常惠的译作使得《项链》被视为“名篇”,而且从1930年开始就被选入不少中小学国语、国文教科书中作为教材,如朱剑芒编《高中国文》(世界书局,1930)、南开中学编《南开中学初三国文教本》(南开中学,1931)、北平文化学社编《初中三年级国文读本》(北平文化学社,1932)、杜天縻与韩楚原编《杜韩两氏高中国文》(世界书局,1933)、叶绍钧编小学高级学生用《开明国语课本》(开明书店,1934)、夏丏尊与叶绍钧编《国文百八课》(开明书店,1935)、张鸿来与卢怀琦等编《初级中学国文读本》(师大附中国文丛刊社,1936)。题名多为《项链》,或为《项圈》。文本多为全选,有些为改编。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

鲁迅因关注其艺术成就而竭力为其推介(1924—1929)

为了给新文学创作提供理论指导,1924年,鲁迅翻译了日本文艺理论家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厨川白村在该书中称《项链》是莫泊桑所著的短篇小说中有了“定评”的